

积极参与和引领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 现状、问题与对策

张志强 杨雅茹 母广伟 李彦 田园馨*

摘要: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内容,通过建设低碳园区、物资赠送和培训等途径提升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经过多年的实践,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依然面临着工作方式单一、进展缓慢和受到欧美等其他国家竞争等多重挑战。为更有效地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工作,建议从系统创新工作机制、构建工作评价机制、加强绿色丝绸之路建设和提升传播能力等方面多角度、多层次提升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成效。

关键词: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三方合作;一带一路

一、引言

南南合作的定义有很多种表述,核心内容是发展中国家之间就知识、经验、政策、技术和资源等发展方案进行分享交流的合作(黄梅波、唐露萍,2013),由于这些国家大多位于南半球,因此它们之间的合作被称为南南合作。中国一直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重要参与者。为积极配合我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工作,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在南南合作框架下,中央财政每年都会安排应对气候变化对外援助经费,主要通过赠送节能和可再生能源设备、分享发展经验、传授专业技术知识、支持编制低碳示范区规划等方式,为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国家和非洲国家等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

*张志强(通讯作者),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邮政编码:100035,电子信箱:beikstone@139.com;杨雅茹,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邮政编码:100035,电子信箱:yangyr@ncsc.org.cn;母广伟,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邮政编码:100035,电子信箱:mugw@ncsc.org.cn;李彦,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邮政编码:100035;田园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邮政编码:100035。

本文系研究阐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积极参与和引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研究”(21ZDA089)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修改建议,文责自负。

持。国内学者对于南南合作研究的文献很多,但是具体到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研究的文献就少很多,主要集中在相关执行机构和学校等部分科研机构。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十百千”项目相关研究(奚旺、莫菲菲,2020;王菁菁、曾红鹰,2020;李彦等,2021;于晓龙、刘援,2021),二是“一带一路”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相关研究(张贵洪、邱昌情,2015;孙靓莹、邱昌情,2016;丁金光、张超,2018;赵斌、唐佳,2020),三是从科技领域技术转移的角度开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研究(刘燕华、冯之浚,2011;刘云等,2016;刘玉姣等,2016),四是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度研究南南合作的机制及其对谈判的相关影响(卢荻梵,2013;秦海波等,2015;冯存万,2015;高翔,2016;祁悦、樊依纯,2017;王克、夏侯沁蕊,2017;刘硕等,2018;王谋等,2021)。

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指出要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本文以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成效与进展为背景,围绕“十四五”时期如何创新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机制、提升援助效果和扩大影响力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现状

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渐严峻,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并推进与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支持、技术转移和培训等工作,提升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水平。

(一)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国际承诺

中国领导人多次向国际社会就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做出庄严承诺,受到多方赞赏。积极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是我国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进程中团结发展中国家、巩固战略依托和展现负责任国家形象的重要领域。

2014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要求大力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支持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拓展培训领域,创新培训方式,帮助有关发展中国家培训气候变化领域的各类人才;2015年9月,习近平在联合国南南合作圆桌会指出,南南合作是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伟大创举,是平等互信、互利共赢、团结互助的合作,帮助我们开辟出一条崭新的发展繁荣之路,伴随着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提升,南南合作在推动发展中国家崛起和促进世界经济强劲、持久、平衡、包容增长中发挥了更大作用(陈贽等,2015);同年11月,习近平主席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会议开幕式,宣布了中国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新举措,提出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个应对气候变化培训指标,得到国际社会热烈响应和广泛赞誉(王菁菁、曾红鹰,2020)。总体来看,中国通过南南合作在“一带一路”建设,

与非洲、小岛屿国家合作等领域,积极助力广大发展中国家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挑战(表1)。

时间	政策与行动
2012年	安排2亿元人民币开展为期3年的国际合作,帮助小岛屿国家、最不发达国家、非洲国家等应对气候变化,从2015年起把每年的资金支持翻一番。
2014年	提供600万美元资金,支持联合国秘书长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
2015年	设立20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同时宣布2016年启动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南南气候合作“十百千”项目,在发展中国家设立10个低碳示范区、开展100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及1000个应对气候变化培训名额,持续推进清洁能源、防灾减灾、生态保护、气候适应型农业和低碳智慧型城市建设等领域的国际合作。
2017年	在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项目下提供5亿美元的援助,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饥荒、难民、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挑战。
2018年	在非洲实施50个绿色发展和生态环保援助项目,重点加强在应对气候变化、海洋合作、荒漠化防治、野生动物和植物保护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推进中非环境合作中心建设,加强环境政策交流对话和环境问题联合研究;开展中非绿色使者计划,在环保管理、污染防治、绿色经济等领域为非洲培养专业人才;建设中非竹子中心,帮助非洲开发竹藤产业;开展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合作。
2019年	启动共建“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将继续实施绿色丝路使者计划,并同有关国家一道,实施“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
2020年	中方支持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建设,支持非洲加强互联互通和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建设,愿同非方一道,共同拓展数字经济、智慧城市、清洁能源、5G等新业态合作,促进非洲发展振兴。
2021年	为非洲援助实施10个绿色环保和应对气候变化项目,支持“非洲绿色长城”建设,在非洲建设低碳示范区和适应气候变化示范区。发布《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宣言》,启动中非应对气候变化3年行动计划,成立中国—太平洋岛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中心,为助力其他发展中国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中国方案”。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信息整理。

(二)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行动

从国际来看,中国积极参加并引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所评价,在达成《巴黎协定》并推动其快速生效的进程中,中国对《巴黎协定》的达成作出了历史性的突出贡献(裴广江等,2015)。近年来,中国通过南南合作在帮助发展中国家互利共赢、协同步调、互相配合和沟通信息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自“十二五”开始,中国政府通过制定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战略,启动了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物资赠送项目,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等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截至目前,中国政府累计安排约12亿元用于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通过赠送节能低碳产品和组织气候变化研修班等方式,帮助小岛屿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洲国家等提高

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目前中国已与36个发展中国家签署了41份气候变化合作文件,帮助受援国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以更快地实现绿色低碳发展。与老挝、柬埔寨、塞舌尔合作建设低碳示范区,与埃塞俄比亚、巴基斯坦、萨摩亚、智利、古巴、埃及等三十余个发展中国家开展38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在能力建设方面,中国共举办45期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培训班,通过开展航天技术与应对气候变化、“一带一路”倡议、绿色低碳发展等主题培训,为120多个发展中国家培训了近2000名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官员和技术人员(徐卫星,2022),提高受训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管理水平和技术能力,并加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相互理解、交流与合作,受到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好评。中国与南非、印度、巴西和韩国等国家建立了气候变化合作机制,并为南太平洋、加勒比等地区的小岛屿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提高其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此外,中国还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欧洲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和机构合作,加强信息沟通、资源共享和务实合作,共同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通过一系列务实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成为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深化团结互信、实现互利共赢的新亮点。

(三)存在的问题

中国为提升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投入了大量的财政资金和专业力量,近年来不论从物资赠送、能力建设还是从项目合作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并被社会各界广泛认可(李彦等,2021)。同时也要看到,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工作方面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改善空间。

1. 援助形式单一,资金用途缺乏灵活性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工作主要围绕物资赠送与能力建设展开,以“十百千”项目为依托,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应对气候变化援助和人员培训。由于受现行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资金只能用于购买物资,不能用于项目研究设计、组织管理、效果评估等使用限制,限制了项目执行机构所需专业人员、管理费用及海外调研等方面的支出,进而影响了项目执行机构的积极性和项目及物资参数适宜性的进一步论证。同时,项目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与受援国需求结合不紧密、受援国工作渠道不畅等问题(刘硕等,2018)。此外,由于国内严格的采购标准,能够纳入物资赠送计划的产品种类十分有限,主要为应对气候减缓类物资,而对受援国在适应气候变化具有直接影响作用的领域投入相对较少。此外,项目为一次性物资赠送,仅通过简单的基础技术培训和5%的额外物资以备品的方式作为项目的赠后服务,缺乏对项目开展全面后期维护和技术能力培训的环节和资金,“软件”输出的不足,减弱了受援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提升。

2. 管理分散,统筹协调能力不足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规章制度仍然存在完善空间,协调与监管机制尚待健全与完

善。2019年9月,负责援外决策、监督和评估等职能的部门从商务部剥离,并整合组建成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预示着对外援助体制改革进入了新阶段。截至目前,对外援助仍涉及外交、援助和财务等多个政府部门并由相关部委分别负责,各部门之间存在着统计、制度以及管理体系等多方面的差异,体制改革缓慢直接导致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管理体制以及相关制度建设受阻(奚旺、莫菲菲,2020)。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涉及多个部门,除新组建的生态环境部之外,还涉及国合署、商务部、财政部、外交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个部门,如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培训班的财务管理办法还在沿用商务部2008年相关规定,其支出标准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物价水平。此外,2015年对外承诺的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由于缺乏统筹协调等多方面的原因,至今尚未成立,影响了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进程和国际声誉。

3. 评估滞后,缺乏全过程评价体系

当前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工作方面尚未建立全过程的定量评价体系与管理制,难以实时评价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于晓龙、刘援,2021)。主要国家的援助机构采取以结果为导向的项目管理制度,在项目设计初期便纳入各项操作标准与考核指标,制定明确、可衡量的具体指标,对项目进行充分的监督与管理,确保项目按照具体目标分阶段执行。这样的设计可以充分保证预设的成果输出,并配合国家战略实施,为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贡献成果转化提供支持。随着国际社会对我国的国际责任的诉求不断增多,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工作成果与成效受到评估体系不完善、统计标准难以统一等因素制约,导致中国国际责任履行的成效、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贡献难以得到充分体现。

在南南合作培训方面,能力建设培训尚未建立系统化的课程制定审核机制,缺乏对受训人员需求的深入了解,以及对课程内容适宜性和实施方法充分性的论证,较难有效满足对受训人员及其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迫切需求。而在项目的实施后评估上,虽然培训承办机构能够很好地收集学员满意度的反馈,但是仍然缺乏系统性根据评估反馈进行修正改进的机制。同时,项目仍然需要加强对其成果的宣传,以提高其国际影响力。

三、积极参与和引领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面临的形势和挑战

中国自2010年开始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南南合作的引领作用不断凸显(徐佳利、梁晓君,2019)。在南南合作的过程中,各国要提高自身发展能力,不能简单套用他国经验,要结合自身国情,在符合市场规律与国际规则的基础之上,走出一条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这是中国为其他国家提供的重要启示之一。同时,也要看到以美欧为代表的传统援助国家,将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等视为其全球战略布局的威胁,通过散布“债务陷阱论”和“污染转移论”等分化和弱化中国的南南合作成效。

(一)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迫切性

全球气候变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具有明显的影响。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指出,随着温室气体排放量进一步增加,本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预计上升0.3~4.8摄氏度,届时引起全球冰川消融,体积减少15%~85%,威胁部分干旱内陆国家淡水资源安全;海平面预计上升0.26~0.82米,进而严重威胁各小岛屿国家领土安全(IPCC,2014)。

对最不发达国家与非洲国家而言,需要面对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粮食安全与国民健康问题等多方面的挑战。世界银行研究显示,到2030年,大量非洲居民都将因粮食减产与水资源进一步恶化等原因陷入极度贫困状态,作物预计减产达20%,每年旱灾影响人口达1800万。对小岛屿国家而言,国家的经济活动中心大都靠近海岸线,极端天气与海平面上升对基础设施的威胁极大。以塞舌尔为例,85%的人口与基础设施均分布于沿海地区,海平面上升将导致大量基础设施损毁,迫使人口向中部高地迁移。加之极端天气频率增加、强度提升,暴风雨和大型海浪还会严重改变当地土地性质,损坏基础设施,导致粮食大量减产,国民生产生活受到巨大影响(World Bank,2017)。

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还面临财政资金匮乏、基础设施缺乏、技术获取能力有限以及组织机构能力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涉及社会各个层面,随着评估体系不断完善、预测指标不断发展,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提升所需成本不断攀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报告显示,全球72%的国家至少通过了一项国家级别的适应计划,但是实际的融资和实施进展远远没有达到所需的水平,发展中国家的年度适应成本估计为700亿美元,预计这一数字在2030年将上升至1400~3000亿美元,2050年将达到2800~5000亿美元(UNEP,2021)。

(二)工作进展受到多种因素制约

应对气候变化“十百千”项目除能力建设之外,均未过半。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如示范区项目开展难度较大,涉及项目元素(如规划、设计、基础设施和运营等)和利益相关方较多,各项工作内容和标准仍在摸索和制定中,进展相对缓慢。另外,在“一带一路”产业合作的过程中,我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的以煤电为代表的高排放项目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2021年中国政府宣布停止海外煤电投资,并且从2020年开始,中国在海外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已经超过了化石能源的投资(周国梅,2021),但是我国在海外大量的钢铁、化工和建材等高排放产业布局依然是潜在的风险领域。此外,原有的援助模式受到受援国工业基础、售后体系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导致一些国家对援助的产品兴趣不高,磋商过程不积极,影响了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物资赠送进程。

(三)南南合作面临着合作机制创新等深层次要求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与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等因素交织叠加,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与形势更加复杂,但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大方向不会改变。

中国将继续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战略,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工作。

全球正面临气候变化和能源危机等多重威胁,发展低碳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成为全球共识,能源需求结构正发生着重大转变。应对气候变化为我国推进绿色低碳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提高国际地位带来重大契机。

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产品众多、市场潜力大,发展模式各具特色,因而在很多方面可以互惠互利、相互支持、相互借鉴,实现共同发展。从目前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新旧动能转换与新盈利模式形成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在“一带一路”、南南合作等国际合作框架下予以解决。在南南合作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兴市场,但这些新兴市场的发展经验均不相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情况下,各国如何走好自己的发展道路,是一个漫长且无法一蹴而就的过程。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进一步加强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需要将其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工作统筹考虑,同时加强与国合署等部门的沟通协调,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思路,加快筹建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在帮助有关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讲好中国故事,分享绿色低碳发展的有益经验。

(一)创新工作机制

拓展工作领域,由现有的以物资赠送和培训为主“十百千”项目拓展到清单管理为主,研究建立以网络为平台的发展中国家申请机制,探索以低息贷款、工程项目和物资赠送等多种形式的南南合作对外援助,建立多种形式的能力建设形式,建立长中短期相结合的培训体系,鼓励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开办学历培训和研究生教育,鼓励企业积极参与技能培训,全方位提升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水平。推动形成物资、技术、人力资源的立体援助体系,继续完善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筹资机制,探索贴近发展中国家需求的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资金使用机制。与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探索开展三方合作,共同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实施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国际合作项目,扩大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合作方。

(二)探索多方参与的资金机制

探索建立多方参与的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机制,探索利用世行、绿色气候基金、亚投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和国际组织等机构出资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结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探索利用市场机制鼓励企业和个人等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工作,如通过公益或小额援助等方式,解决发展中国家粮食供给问题,为发展中国家援助农业器具等。通过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方式,拓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援助途径,形成多方合力的工作格局。

(三)加强绿色丝绸之路建设

推进“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在加强国内绿色低碳标准与国际标准对接的基础上,建立“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术与产业合作平台,推进与“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在绿色基础设施、能源和投融资等领域的务实合作。积极推进中国-东盟、中非、中阿合作,利用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等途径,深化在应急物资储备库、防灾减灾和绿色能源等领域的合作,将陆上、海上和冰上丝绸之路打造成中国在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领域的标杆和典范。

(四)建立健全南南合作评估体系

探索建立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评估体系,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全流程评估,在评估体系中纳入联合国系统、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等,形成覆盖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的评价体系,并将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成效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结合起来,建立涉及需求、筹资、生产、交付、监测和后评估等全流程的评估报告制度。鼓励第三方机构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南南评估,在政府评估之外,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培育和鼓励市场化的专业评估机构参与评估。

(五)加强南南合作的宣传

一是建立南南合作知识共享平台,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经验交流与分享,并通过共享双方的供需信息,实现精准援助。二是加强媒体传播,通过媒体报道反映各方的工作进展,并及时收集受援国各方的反馈,特别是在援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今后更有效地开展合作提供信息反馈。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宣传重点在于加大第三方媒体的报道,特别是深度的报道,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力,此外,还要重视加强对于海外自媒体的运用,通过一些小切口的事件,体现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理念和价值观。针对一些能产生现象级的传播事件,需要进行预先部署和议程设置。通过网络化多层次的传播渠道,使南南合作真正成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际交流合作的“中国方案”,并切实为提升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陈贇,王丰丰,孟娜. 习近平在南南合作圆桌会上发表讲话[N/OL]. (2015-09-27)[2022-01-23].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9/27/c_1116689451.htm.
- [2] 丁金光,张超.“一带一路”建设与国际气候治理[J]. 现代国际关系,2018,(09):53-59+43.
- [3] 冯存万. 南南合作框架下的中国气候援助[J]. 国际展望,2015,7(01):34-51+153-154.
- [4] 高翔.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进展与展望[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4(01):38-49.
- [5] 黄梅波,唐露萍. 南南合作与中国对外援助[J]. 国际经济合作,2013,(05):66-71.
- [6] 李彦,田园馨,杨雅茹,宋雨彤,张志强. 新时代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策略研究[J]. 世界环境,2021,(04):25-28.

- [7] 刘硕,张宇丞,李玉娥,马欣. 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对《巴黎协定》后适应谈判的影响[J].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18,14(02):210-217.
- [8] 刘燕华,冯之浚. 南南合作:气候援外的新策略[J]. 中国经济周刊,2011,(09):18-19.
- [9] 刘玉姣,安道渊,张维. 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实践[J]. 科技和产业,2016,16(05):144-147.
- [10] 刘云,辛秉清,陈雄. 发展中国家气候变化技术需求与转移机制研究[J]. 科研管理,2016,37(S1):356-361.
- [11] 卢获梵. 国际气候援助状况及中国气候变化对外援助研究[D]. 北京:外交学院,2013.
- [12] 裴广江,李永群,邢雪,王远. 全球气候治理迈出历史性步伐[N/OL]. (2015-12-24)[2022-01-21]. <http://world.people.com.cn/GB/n1/2015/1214/c1002-27923140.html>.
- [13] 祁悦,樊依纯. 基础四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政策行动及启示[J]. 世界环境,2017,(01):60-63.
- [14] 秦海波,王毅,谭显春,等. 美国、德国、日本气候援助比较研究及其对中国南南气候合作的借鉴[J]. 中国软科学,2015,(02):22-34.
- [15] 孙靓莹,邱昌情. “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的南南合作:路径与前景[J]. 广西社会科学,2016,(02):135-139.
- [16] 王菁菁,曾红鹰. 深化全球气候合作:推进南南合作,搭建共赢平台[J]. 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2020,(05):29-31
- [17] 王谋,康文梅,张莹. 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优先合作国家选择方法探讨[J].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21,17(06):744-751.
- [18] 王克,夏侯沁蕊. 《巴黎协定》后全球气候谈判进展与展望[J]. 环境经济研究,2017,2(04):141-152.
- [19] 奚旺,莫菲菲. “十四五”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形势分析与对策建议[J]. 环境保护,2020,48(16):65-67.
- [20] 徐佳利,梁晓君. 联合国南南合作创新:结构、理念和模式[J]. 区域与全球发展,2019,3(04):23-52+153.
- [21] 徐卫星. 推进“1+N”政策体系落实,形成减污降碳激励约束机制[N/OL]. (2022-03-28)[2022-03-30]. http://epaper.cenews.com.cn/html/2022-03/28/content_75128.htm.
- [22] 于晓龙,刘援. 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物资赠送项目评估研究[J].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21,17(05):608-620.
- [23] 袁勇. 习近平主席在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更大贡献[N/OL]. (2017-09-06)[2022-03-02]. 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709/06/t20170906_25779841.shtml.
- [24] 张贵洪,邱昌情. “一带一路”建设与南南合作创新[J].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5,(01):3-15.
- [25] 赵斌,唐佳. 绿色“一带一路”与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以议题联系为视角[J]. 教学与研究,2020,(11):86-97.
- [26] 周国梅. 可再生能源成“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主力军[N/OL]. (2021-08-26)[2022-02-05]. <http://zhb.org.cn/hbzx/news/2021-08-26/12382.html>.
- [27] IPCC. AR5 Synthesis Report: Climate Change 2014[R]. 2014.
- [28] UNEP. Adaptation Gap Report 2020[R/OL]. (2021-01-14)[2022-02-13]. https://www.unep.org/resources/adaptation-gap-report-2020?_ga=2.52398762.2028866807.1649324297-578807817.1644572234.
- [29] World Bank. Unbreakable: Building the Resilience of the Poor in the Face of Natural Disasters (2017)[R]. 2017.

Actively Participate and Lead the South–South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Situation, Problem and Countermeasures

Zhang Zhiqiang, Yang Yaru, Mu Guangwei, Li Yan, Tian Yuanxin

(Natural Center for Climate Change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bstract: South–South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improve the ability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low carbon pilot, material giving and capacity building. After years of practice, the current South–South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is still facing multiple challenges, for example, single working mechanism, slow progress, and competition from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South–South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it is suggested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South–South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and levels, such as systematically innovating work mechanisms, building evaluation mechanism,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Green Silk Road and improving communication capacities.

Keywords: Tackling Climate Change; South–South Cooperation; Tripartite Cooperati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JEL Classification: Q54, Q58

(责任编辑:朱静静)